

大宋美学: 千年一叹 造极一朝

■ 王家儒



一骑绝尘的绘画艺术

在宋代所有艺术领域中,绘画无疑是皇冠上的明珠。它不仅以“山水画”范式创造了一个比历代更为亲和、宽泛的“天人合一”艺术世界,还开启了“文人画”写意精神,直觉式的“禅画”逸格,为中国

哲学里“空”“虚”“无”的美学观念落地与自由延展拓开了一个更为宽广的空间,从而引领中国人的审美追求进入更为静观、深沉的世界。

这是历史上一个把文化与美发挥到极致的时代,上自皇帝、官僚士大夫,下至知识精英、地主乡绅、商贾市民组成了一个庞大且更有文化教养的阶层,加上宋徽宗不遗余力

地给力,佑文政策下宫廷画院、画学风生水起,人才济济,山水、人物、花鸟、佛道各种样式并驾齐驱,蔚为壮观。尤其是脱胎于自然山川的“山水画”不仅成为帝王“江山”与“天下”的意象符号,也是许多通过科考进入仕途的士大夫们进取与退隐的精神归宿地。至此,山水画终结了历代以人物画为霸主的地位,跃居为中国绘画艺术的魁首。

自然与艺术完美平衡

两宋山水画在唐、五代壮阔雄强的基础上,以坚凝厚重的墨色、笔力雄健的皴法取代了隋唐单线勾勒、富丽堂皇的青绿山水模式,去表达山水的精神风骨,以寄托人生的理想与境界。像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为代表的纪念碑式山水画整体地把握自然山川浑厚而又和谐的秩序感,表现出一种情感与观念多义性的“无我之境”。前者气势雄浑壮美,境界高古幽渺,后者气格浑厚深远,意韵激荡清新。即使是像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虽然仍采用青绿山水的手法,但其笔下的坦荡与豪情已不是隋唐

时期的浓丽华美,而是一种平和、辽阔、悠远的绝唱。

如果说以范宽、郭熙、李成、关仝为代表的北宋山水体现的是浑厚端庄、壮美伟岸的美学风格,那么以董源、巨然和马远、李唐、刘松年、夏圭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山水则是淡远雅致、简约含蓄的美学风格。南宋山水画艺术风格的建立一方面由于北宋灭亡,整个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被迫南迁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江南云烟疏雨、空灵毓秀的独特自然风貌也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与灵感。这一审美观念的变革逐渐发展为无奇崛之笔、清丽淡雅的艺术风格,并通过淡墨轻岚的山川小景去轻吟与叩问生命的意義与价值。像董源的《潇湘图》、巨然的《秋山

问道图》、马远的《踏歌图》以平淡天真、缥缈轻逸的笔墨去抒胸写意,而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的《溪山清远》《水经春行》等小品则更为含蓄谦卑,即使是一截枯木残柳、一片残山剩水,也在局限与困顿中展现出生命的光彩与自信,在残缺的空白中绽放出孤寂之美。

北宋的雄浑、壮阔、崇高、豪迈,南宋的闲散、宁静、优美、含蓄这两者迥然不同美学风格的山水画各领千秋,共同铸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丰碑。美国著名艺术史专家高居翰认为:“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与艺术取得了完美的平衡。艺术家好像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然,以惊叹而敬畏的心情来回应自然,他们视界之清新,了解之浑厚,是后世无可比拟的。”

开创“诗书画” 三者合一先河

经过两宋山水画家的开拓,中国绘画艺术完成了由唐代“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繁华绚丽到水墨空灵韵秀的华丽转身。在这种灿烂的文化背景下,强调“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状物言志、不求形似的“水墨写意文人画”在苏东坡、米芾、文同等一大批士大夫文人的推崇下

应运而生。这批饱学全才的大文豪用他们的新理论及实践去揭示事物的内在精神性,以“有我之境”的写意精神去开创“诗书画”三者合一、文学与绘画相结合的先河。

两宋绘画除了影响朝野的院体画、士大夫文人画外,还有另一支以梁楷、牧谿为代表的非主流的“禅格”艺术。他们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独辟蹊径的直觉式表现手法,明心见性、笔简意赅的艺术语言超越了同时代人的观念。像梁楷的《李白行吟图》《泼墨仙人图》《秋柳双鸦

图》、牧谿的《六柿图》《潇湘八景》等这些前卫性的作品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但这种强调直觉,将最深邃的意义寄予最简单形体的超拔艺术创造力,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星空上划出一道耀眼光芒,其精神能量深深地滋养着中国艺术的血脉与品格。这种艺术精神不仅在倪云林、徐渭、石涛、八大、弘仁身上达到水墨写意画的高峰,还对日本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掐丝珐琅天鸡尊

清乾隆掐丝珐琅天鸡尊是中国清代的作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掐丝珐琅天鸡尊是铜胎,仿铜器天鸡尊形制,凤首,喇叭口,背和尾部的T形棱脊镀金,颈均蓝地满布各色羽毛、缠枝花、凤鸟及拐子龙等纹饰,以内卷的尾羽和镀制成拐子龙形状的双足为座,器物沉重,釉色鲜明艳丽,是上好的陈设器。属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文物。

天鸡作立身翘首状,背负螭耳尊,双翅扬起贴于尊身,足蹬镂空双轮,长尾下垂内卷,尾羽内侧立一铜镀金小天鸡。螭耳尊椭圆体,撇

口,螭耳镀金。天鸡胸前贴饰片状彩云,中间嵌长方形铜镀金片,其上阴刻“乾隆年制”单行楷书款。整器以红铜作胎体,掐丝花纹内填入珐琅彩釉,露铜处镀金。天鸡身上随形作出羽毛状饰纹,尊表面饰缠枝莲纹。

天鸡作为一种传说中的神鸟由来已久,具有吉祥之意,但其具体形象的塑造则在清代乾隆朝才开始成熟。乾隆时期造办处曾以不同的工艺制造天鸡形象,令人耳目一新。此掐丝珐琅天鸡尊器形优美,形象生动,色彩富丽,镀金辉煌,透露着一种神异之感,体现了乾隆时期珐琅制作工艺的精湛水平。

(杨道辑)

虽然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赵元任却学会了说常州话、常熟话和苏州话。1907年,赵元任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在那里,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英语和德语,这些在常人眼里艰涩难懂的外国语,在赵元任眼里却非常有趣,他一头脑钻进去便不能自拔。因为这些语言学起来好玩而有趣,年轻的赵元任便在心里暗自发誓,以后尽可能多地学习他国语言。

18岁那年,赵元任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庚款留美官费生,并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来到更广阔的天地后,赵元任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新的知识。此时,他的语言天赋显露无遗,与其他学生不一样的是,赵元任可以同时学习好几种语言。几乎每一天,赵元任都会泡在图书馆里,早上

桌子上摆放的可能是一堆英语书籍,到了下午,桌上的书很有可能变成了德语书籍。当时,谁也不清楚他一天到底能看多少本外文书。

正是因为他这种能吃苦的学习劲头,短短几年下来,赵元任便能熟练地在十多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中随意切换。赵元任曾谦虚地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法文、德文都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希腊文、俄

罗斯文等也都不成问题。”有些人不解地问他,为何如此热衷语言的学习,赵元任微笑着回答:“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原因,纯粹是学起来有趣好玩。”

赵元任一句看似波澜不惊的话,其实背后藏着颇多的深意:除了对语言文字无尽的热爱外,更多的,则是那种在学习上不怕吃苦甘于寂寞的钉子精神。

寒露涤秋觅菊华

■ 张意薇

10月8日寒露节气,又后六日为重阳。《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为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属于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此时,即便是纬度较低的琼岛地区,经历了几场台风,也基本褪去了暑热,慨然有人秋之感。古往今来的圣哲达人,便在这流光荏苒中以寒露漫尘心夙志,用诗章抒发高趣雅怀。

晚秋菊隐华

明代海南先贤丘濬的学生陈縕曾如是描绘寒露时节的琼州山水:“琼台十县与三州,屹立南溟抗百流。水接扶桑先得日,山逢寒露未惊秋。云横婺母堆双髻,雾散陶公出一头。只道瀛洲登未得,不知身已在瀛洲。”(陈縕《海南风景》)

明唐胄编撰的正德《琼台志·土产》称海南“菊品最多,叶相似而色不同”。海南的菊花若按颜色和形态命名,比较出名的品种便有大黄、小黄、兔儿、鹅毛、万卷书红、十样锦、销金、金盏银台、墨菊等等。《琼台志》还顺带提及了北宋文豪苏轼与海南菊的一段趣事。苏轼被贬谪到儋州后曾颇有雅兴地种植菊花,并提前两月广发请帖,邀约朋友们重阳赏菊饮酒。可重阳将至,菊花却没有绽放的意思,以致东坡先生的菊花宴只得推迟到农历十一月中旬才补办。后来,苏轼不无感慨地总结道:“岭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而菊独后开。考其理,菊性介烈,不与百卉并盛衰……”(苏轼《记海南菊》)于此,海南便有了“菊花开时即重阳,不须以日月为断”的浪漫佳话。

丘濬赞叹迟开菊花的秋丽馥郁:“浅红淡白间深黄,簇簇新妆阵阵香。无限枝头好颜色,可怜开不为重阳。”(丘濬《十月见菊》)又云:“菊花开是晚秋时,虽是开迟落亦迟。漫说东风花卉好,等闲开落又空枝。”(丘濬《叹菊》)和春夏扎堆儿争相竞妍的群芳比较,晚开晚落的海南菊颇有点大器晚成、后来居上的意思。

殷殷归鸿意

公元726年,唐代名臣张九龄因受牵连,由中书舍人出任洪州都督,在洪州作《在郡怀秋》二首。诗中流露出光阴易逝、功业无成的忧惧,又因时不我用,萌生了思归之情。七百多年后,丘濬在《唐文粹》中偶然读到张九龄那句“宦成名不立,志在岁已迟”,有感于自然草木之性与人情世故道理相通,因而次韵:“缅怀先哲言,志在岁已驰。业业慎永图,深恐有所疵。”(丘濬《秋怀》)丘濬以同样出身岭南的贤相张九龄为榜样,一生朝乾夕惕、奋力国事,可岁月如白驹过隙,走到人生的深秋,他最难以消解的就是愈发浓重的乡愁。到了春夏,明镜中更添秋霜白发,在江湖与庙堂之间,丘濬有了“有山不归去,何劳忆山吟”的盼归之语。

民间俗谚云:“大雁不过九月九,小燕不过三月三”,意思是大雁南飞的时间最迟不过重阳节,小燕北归的时间最迟不过上巳节。寒露三候中的“鸿雁来宾”即是指寒露时节最后一批大雁南迁。“越客不识雁,闻之心辄悲。自怜长作客,不似鸟知时。”(丘濬《闻雁》)丘濬久滞京畿,看到大雁尚且可以根据时令迁徙,而自己却负载着游宦他乡的羁旅客愁,真是人不如雁,身不由己。

思乡的情绪贯穿了丘濬大半生,且每逢入秋愈甚。1464年,步入仕途十年后丘濬写道:“塞雁随阳如有约,岭猿叫月已无肠。褰裳花下愁沾露,散步林间怕履霜。此日不妨多酌我,壶中大醉醉乡长。”(丘濬《秋兴七首》)雁飞猿啼的秋景,本就令敏感的异乡客愁肠百结,复有寒露沾衣,则更增晚秋的凄冷之感。而他所能做的,就是暂时放下愁绪,在与友人的觥筹交错中寻找一些深秋的温暖与慰藉。

故乡的亲友与风物总惹情伤,老来愈甚。“访旧怜俱老,逢人厌恶说归。伤心秋又暮,未寄北堂衣。”(丘濬《秋晚答友人》)入夜愈发寒凉,虽有故友叙旧,却不敢再聊归意,只怕触及乡情便泫然涕下。俗谚云:“吃了寒露饭,单衣汉少见。”他惦记家中老母是否需要添衣,琼北虽不比京师寒冷,却也已是深秋啊!

“客里悲秋亦自悲,可堪临老苦思归。厌行西月闻鸡叫,愁看南风见雁飞。”(丘濬《己酉秋思》)“己酉”即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此时离丘濬去世还有六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提及面临着北方秋日的冷雨苍苔、寒风败荷,睹物伤情,更是思乡。可虽皓发皤皤年近古稀,且罹患眼疾几近失明,却终因股肱之臣重担难卸,未能获准乞养归乡。

消除秋愁秋悲亦是寒露时节养生要务之一。丘濬作《四时吟》咏秋:“天上片云无有,江心孤月自明。水净何如心净,风清亦似人清。”景语亦是情语,时逢重九,更深露重,无论何时遇,还是莫要夜阑听风、心忡不寐,不如赏菊、登高、吃蟹、小酌。

文史荟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

趣学语言的赵元任

■ 姚秦川

赵元任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在语言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通晓中、英、法、德等多种语言,并能运用现代语言理论和科学技术研究语言文字。令人惊讶的是,赵元任之所以如此喜欢研究语言,竟然全是因为它们“学起来有趣好玩”。

13岁那年,赵元任的父母相继去世,他被送往苏州的姨母家里。

虽然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赵元任却学会了说常州话、常熟话和苏州话。1907年,赵元任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在那里,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英语和德语,这些在常人眼里艰涩难懂的外国语,在赵元任眼里却非常有趣,他一头脑钻进去便不能自拔。因为这些语言学起来好玩而有趣,年轻的赵元任便在心里暗自发誓,以后尽可能多地学习他国语言。

18岁那年,赵元任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庚款留美官费生,并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来到更广阔的天地后,赵元任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新的知识。此时,他的语言天赋显露无遗,与其他学生不一样的是,赵元任可以同时学习好几种语言。几乎每一天,赵元任都会泡在图书馆里,早上

桌子上摆放的可能是一堆英语书籍,到了下午,桌上的书很有可能变成了德语书籍。当时,谁也不清楚他一天到底能看多少本外文书。

正是因为他这种能吃苦的学习劲头,短短几年下来,赵元任便能熟练地在十多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中随意切换。赵元任曾谦虚地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法文、德文都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希腊文、俄